



漫談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

Guo Tingyi's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王爾敏 (Wang Erh-min) *

一、緒言

郭廷以(量宇)先生是20世紀中一代史學大師，備受中西學者尊仰。生平著作等身，而開拓近代史一門學術之宏大規模，更是炳炳烺烺，留下傳世之宏業。我輩後生追隨大師，俱能自由觀覽，隨意採輯，而於研究論著，得以有效運用，俱是得自於師門教導。我和我的同門學長，親承師教陶冶，終能立身士林，學有專成，足以供後世長期參考比較。

當世史學界同道撰文述論郭廷以先生的學問道藝者已有多人，首先當推郭先生前期大弟子唐德剛先生，他早已多次稱述郭先生的學問，最足參證者載於唐氏近著《晚清七十年》中的一篇〈中國近現代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¹另一文收載於陳三井所編《走過憂患的歲月》，²這兩書自能代表郭師門下高弟一些早期學行的回顧。



第二種重要介紹，是郭先生後期大弟子呂實強先生，在郭師生前，呂先生以近代史史學開拓者為主旨介紹郭先生的學問，收在遼耀東所編的《拓荒者的畫像》，³這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呂實強並為郭師沒世後結集其遺著，出版《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⁴並於序文中綜合介紹郭師的史學成就與貢獻。這兩書是必讀的參考著作。

第三種文書，是量宇先生大弟子陸寶千先生所編纂的《郭廷以先生書信選》，⁵其中反映量宇師與近代史所內外友人以及弟子之間的種種對話。可藉以了解郭師的平易近人之處並其器重門人子弟之一面。

第四種著作出於後期大弟子張朋園先生以專題形式著成《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⁶重點在介紹郭先生所親身經營的國際學術交流之各種計畫與其具體成就。

第五種記載是量宇先生後期弟子陳三井先生所編

* 作者係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現職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1 唐德剛著，《晚清七十年》，第一冊，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85年，頁263-282，原載《中外雜誌》59卷1期。

2 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2月印。

3 遼耀東編，《拓荒者的畫像》，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民國65年印。

4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6年6月印。

5 陸寶千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2月印。

6 張朋園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80，民國86年5月印。

《走過憂患的歲月》，收輯郭先生門牆菁英對其調教薰陶的追憶與崇拜。

第六種文獻，出於門人張朋園、陳三井、陳存恭、林泉四人對郭先生的口述史訪問筆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⁷在前後五年之間，經過15次訪談筆錄，最後綜合完成定稿，達315頁，是郭師親口自述的回憶錄。

在上述六種主體記載之外，尚有一些紀念性短文，自不及此六種文獻之重要。

在我個人而言，自是量宇師後期及門弟子，我就是只寫過三篇紀念師門的短文，不具重要性，可以略而不論。不過在量宇師後期眾弟子而言，我不能自承是大弟子，卻也是開拓師門學問的一個有成績可驗的守門之人。我是大師門下的末學後進，以我受教之深，承師垂愛之切，提攜之力，也應當勉力與前述諸學長共同宏揚師門學業。換言之，我為報答師門厚恩，必需努力作一些回顧的陳敘。這就是我撰寫此文的動機。

二、郭廷以先生之學術造詣與治學精神

我與同門諸學長，俱受郭先生親身教導，再加追隨他研究學習，前後二十餘年，我列於大師門牆如此之久，深以為得天獨厚，是十分幸運，其他同窗，相信必亦各有領會。我自感受恩深重，又是多年追隨，當然領悟既多亦深，進益亦多。回瞻郭師學問識量，仍有諸多卓越造詣，為後生者，默識於心，亦當表白於世，備學人參閱。前舉諸學長之載筆，已足供流觀，而我還是要盡所知以為末學補綴，使後世知曉郭師對於20世紀史學之貢獻。

郭廷以先生的史學學術功力，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中華民族自古代即熟悉

天象，精於曆法，史家造詣，始於謹嚴之紀年，三代已立史官制度，年代學即史官專長，人人俱備於天文曆法，屬史官基本職能。20世紀前期，年代學仍為治史根本，是以史表年表名家輩出：羅振玉、閔爾昌、陳垣、董作賓、鄭鶴聲、高平子、譚其驥、劉大白、姜亮夫等，俱負當世盛名。郭廷以先生則專注於中國近代史與太平天國史，並躋身於當代年代學名家之林。綜計郭先生生平有關年代學著作有《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二冊，⁸《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一冊，⁹《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二冊，¹⁰《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冊。¹¹所載要事要言，足備學者查考採輯，以見史乘脈絡。

當世若干學界名流，好高騖遠，學疏識淺，多不重史事表系，以為片段散碎，不成文章，一向鄙薄年譜年表之作，形成風氣，於今愈甚。自是只見浮面，而不知史事脈絡以年代秩序而備縱橫比觀之便，細審可察知彼此之互相影響與先後承轉，最能建立通識。郭先生原不自承是學術論著，但以編製日誌，方便後人查考，乃古史官職司所寄，不以個人成名為念。《左傳》流傳千古，久為史家廣事徵用，自亦出於編年之作，而名實俱冠史乘之首。春秋家者，固史官之天職，決不同於今日賤儒之汲汲營求，立名於世，故自不屑以餘力為後人關治學之坦途。我個人追隨師門，自編纂史料入手，而每種史料俱附編年表，因而自以年代學為治學根本，是得自於郭先生傳授。雖於今治史，仍深信編年史不可廢。做為史家不能妄忽編年史之重要。

第二層則須陳敘郭廷以先生的古今通識與其在近代史上的著作。郭先生有三種專書是通史性的寫作手法，是史家融會貫通的成熟之作。計為《臺灣史事概說》，¹²《俄帝侵略中國簡史》，¹³和《近代中國史綱》。¹⁴當然郭先生為軍中袍澤所寫的《中華民族發展

7 張朋園、陳三井、陳存恭、林泉編，《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6年6月印。

8 郭廷以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二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35年印。

9 郭廷以著，《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6年印。

10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二冊，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2年印。

11 郭廷以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4年印。

12 郭廷以著，《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民國43年印。

13 郭廷以著，《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臺北：臺灣書店，民國43年印。

14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年印。

簡史》，¹⁵和另一種簡要的《中國通史》，¹⁶是專供軍中將校閱讀的簡史，也是用筆謹嚴，宗旨純正，只是非一般公開發行之書，當不必計。

前述量宇師的通史性著作，所以稱為史家成熟之作，蓋其著作形式截然不同於當世學界專論形式之著作。對於我不陌生，我自己的十五種專書，全是歷史專論形式。我卻決不堅僻自是，也盼他人不必敝帚自珍，因為史學之浩瀚，表達方式各展才識，各擅勝場。史家成熟之作在其融會貫通，自出杼機，故不用小註，減少冗長引文，而自出簡賅明快之筆法，述事一氣呵成。雖然以簡賅覈實為用，而句句皆有依據，事事皆本之史料，惟同道識者方知其經緯，悟其精要，通其因果，見其得失。我讀《近代中國史綱》，每章每節，領悟特多，書中要言不繁，含意深遠。我與友人李金強博士，計為學生導讀此書，惟李教授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向學生講解《近代中國史綱》，行之有年，我則無此機會。不過我曾為此書作補註與解說，但以個人學問，深覺力不能逮。此書精深而識遠，醇正而博雅，後之學者難以望其項背。

第三層要敘述，郭廷以先生的著述有專書亦有專文。民國 29 年（1940）及 30 年（1941）郭氏所作《近代中國史》第一、第二兩冊，¹⁷各具詳明章節，直接引證史料，註明來源，清晰明確。此二書各達六百餘頁，並附參考書目，都是堅實之研究力作。許多學者抄襲其中引文，自做論文，不提郭廷以一字，我是早經看破學界之偷苟取巧，此類著作難逃我的法眼，我不揭穿，是高抬貴手，並不予計較，但告門人勿做此不名譽之事。此書詳備深入，體系完密，今世講究專著者，豈有置喙批評之地？我熟讀其書，自具心得。

郭廷以先生撰著的論文，其中重要者 19 篇，於民國 76 年（1987）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結集印行，題為《近代中國的變局》。每一專題文章，俱有卓越識見，論據堅實。我個人心得，可以略舉其重要貢獻。

郭廷以先生是照顧近代史全局的大師，撰寫專題論文，必選擇某一重點入手。我們後輩習於做專題研究，而郭先生在其《近代中國史》第一、二兩冊已是把重點放在兩個專題領域，一是早期中外關係，一是鴉片戰爭。至於其他論文重點，則分別處理數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

其一是最早提出中國近代化問題，其二是中國與世變的問題，其三是西洋文化的輸入與科學民主之輸入，其四是中外關係，包括中英、中日、中俄、中越之外交關係，各就某個突出重點，提示一定論證，其五是專門析論太平天國的集權統治，其六是臺灣開發與現代化。其個別論文，亦均表現綜合宏觀，可供後世參酌。

郭師的學術造詣，最早以太平天國史研究奠定其學術地位。研究近代史的學者都知道太平天國史有三位先驅，一位是簡又文，他力倡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一位是羅爾綱，他力倡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另一位就是郭廷以，他力倡太平天國是集權統治。他們三人各有立場、各有建樹，後世學者一一通覽其著作，自可估量各家功力識見。

三、創建近代史研究所的締造歷程

有關近代史研究所本身的專著，在近二十年來，已有兩種問世，但我相信這多年來，少有真正閱讀者，書名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¹⁸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前書是多人分撰，合輯一書。後一書，不具作者姓名，卻是郭廷以先生自始親手草撰，繼交王聿均先生負責整理，雖是薄薄一冊，而內容充實，言簡意賅。尤其特重於關係重要之大事，讀之可以概覽近代史研究所發展的步履足跡，與其成員之勤奮治學，出版物之逐年增長，中外名家學者研究人員之來往進出，研究計畫之歷年展現，特別是郭師之日日講學施教，可以洞見此一研究機構之奮揚生

15 郭廷以著，《中華民族發展簡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民國 42 年印

16 郭廷以著，《中國通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民國 49 年印

17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 29 年印，第二冊，民國 30 年印。各佔六百餘頁。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2 月印。

機。我讀之獲得印象最深，產生無限領悟。我認爲此書極其重要，爲學術發展史留存不可磨滅之紀錄。¹⁹

我寫至此節，就是參考上舉二書。並鄭重推薦世人，爲治 20 世紀史學者須加詳審參閱。

我參考前書，撰寫此文，無須再事重複這兩書內容。只求以嚴肅態度，寫出在郭師主持近代史所的時期中種種重大關節。請識者一面參閱前書，一面比對我所追求的種種學術史跡，以供天下高明之家在學術識斷上有所參酌。

一個重要學術機構的誕生，自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和背景。這不是宿命觀，而是時代的因緣際會。學術上的先例，像中央研究院的創立，一定是要到民國 17 年北伐統一後國家對政府教育文化有全盤擔當，與啓步建國網羅人才有直接關係，並非偶然出現。其他近代事物，亦多可找到一個融會的動力，在此不必多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局，是美俄兩強爭持的局面，不光軍事對立，最根本關係到資本主義制度與共產主義制度在全球勢力的消長。兩種制度的對峙，首先是兩種思想文化的較量。當時身爲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先生，極具高遠識斷，以其在學界的領導聲望，用微薄財力，於 1950 年創辦《大陸雜誌》，網羅一時學者專家爲之撰稿。同時與海外學者會商，計劃在中央研究院開設近代史專業研究機構。朱家驊與海外學人大力促成，於 1955 年 1 月決定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敦聘郭廷以先生主持籌備。並於 1955 年 2 月 1 日正式開創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之初極具關鍵性的大事，是接收收藏外交部舊檔，這批舊檔包含了清代總理衙門至民國 15 年北洋外交部的檔案。

我國外交耆宿前輩中具有遠識宏量、最值得表彰，就是當年主持外交的葉公超、時昭瀛、沈昌煥、朱撫松等四位，以及兩位當時是青年外交家楊卓膺先生和石承仁先生。原來郭廷以先生在創所之初與陶振譽老師親與外交部接洽，請求將其過時舊檔移交本所收藏。當時的部長葉公超、次長時昭瀛十分贊成將外交檔交學術機構整理。又有沈昌煥也同意移交。實際經理全部交接是司

長朱撫松。很快分三次送交近代史檔案約 240 箱。近史所係由王聿均、李毓澍兩先生與朱撫松分數次接箱點盤，轉運近代史所。更實際在近代史所開箱按檔卷點交，乃是由科長楊卓膺和青年外交官石承仁天天到所點交登記冊簿，近史所則由呂實強、李國祁、鄧汝言、王爾敏，按件登錄驗收。交接期間，每天人人都弄得滿臉黑灰，塵屑滿身。我必須表彰這些外交家珍惜國家檔卷的識力眼光。我不斷的重申此事，就是要強調前人偉跡不容磨滅。此事是我們創所第一年的重要工作，可謂是驛路藍縷。

近代史研究所的創立，是平地開建，一切俱須自零做起。郭廷以先生一人獨力擔當，樣樣親自規劃開拓。上面有中研院朱家驊院長支持，而協力相助者有總幹事周鴻經，以及張貴永教授、陶振譽教授兩位郭先生的知交。在門人之中只有王聿均一人略可分勞。我親身所見，深知郭先生一人投入最深，擔當最重，擘畫最多，責任亦最艱鉅。這一點他書似未嘗論及，我雖是末學後進，亦有責任向世人略加陳述。

一個學術機構的研究資源，不外乎圖書設備、經費、學術交流、以及培訓人員。這些在他書中已有交代，並舉實質數據證明，可勿重複詳敘。但關鍵是郭師如何經營擘畫？如何主持研究教導後生？茲可依次略敘。

第一，最重要、卻較爲單純的要項是圖書設備。近代史所是徒手起造，一開始即分別向香港、日本、美國購置圖書；香港是重要來源，中文書俱來自香港。不過最重要和最珍貴的資源是在 1955 年接收大批外交檔案，共 240 箱（分三批接收），以及嗣後郭師向經濟部接洽移管其舊藏檔案，自民國 55 年起至 73 年（1966-1984）先後接收經濟部檔案七百箱。除郭廷以先生外，在呂實強任內亦繼續接收。特須感謝當年經濟部李國鼎部長以及後來的孫震、趙耀東、王昭明等先生對學術研究的尊重。²⁰

第二，研究人員的啓導與培訓，是郭廷以先生對近代史所的最大貢獻。我追隨受教二十年，忝列門牆，深自了悟。除張貴永、陶振譽兩位老師，學術重心幾全集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2 月出版。

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 223-250。

中於郭師一身。包括他前期中央大學三位大弟子，我們後進學子，前後不下二十餘位。要了解郭師訓迪子弟的勤嚴周遍，可參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在郭師任所長期間多數為全體同仁講解近代史，不下數十次之多。就是本所各研究人員的論題報告，郭師無不一一親自指導啓發，其記錄亦俱登載於大事紀要。²¹自此以觀，郭師亦正是我們全體的領路老師。我們每人俱是經其一手調教而成就學人，我是終身感念師恩，我今有何成就，俱是得自師門。

郭廷以先生平日不苟言笑，意態岑靜嚴肅，我們後生都頗為懼怕他。其實他宅心仁厚，對學生愛護有加。只是難得聽到他一句稱讚。一是我們初編《海防檔》，一切做法由郭師指示。他對我們初入門的人不放心，把我草撰的年表送交羅家倫先生閱看，羅先生閱後，回批「並無不妥」，王聿均先生曾經向我告知，郭師至此對我們幾個門人弟子信任堪以造就，頗為放心。另一事是我寫成第二本專刊《淮軍志》，他閱看並加修飾，最後拿給我，當面向我說：「你寫得很深刻」。我真是感動極深，感念夫子的肯定鼓勵。不過我不是郭師最賞識的門人，同學中李國祁、呂實強、張朋園三人是最受郭師器重的人才，他們三人不但各具專長，而學問精博，才識堅卓，俱在我之上，為我所傾服。

第三，經費問題連帶著研究計畫的執行。二者是一體之表裏，郭師雖是近代史大師，如果沒有充足經費，也無法推動研究計畫。所幸郭師聲名遠被，在海外學界相知不少。當時國家經費拮据，所中只能維持十數人員人事費，難再有餘款應付研究計畫。而在郭師一開辦研究所即與美國學術機構取得合作契機。首先有亞洲協會捐助購書費用，並特別捐助出版基金。又有華盛頓大學支助編選中俄關係史料。又有哈佛燕京社捐款編輯《教務檔》和《中國近代對西方之認識》，又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展開《口述史》訪問計畫。最後在郭所長晚年，分別由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各請郭師駐校研究一年，而在此期間則使郭師安心撰寫《近代中國史綱》一書。關於一直對近代史研究所和郭所長具深厚情誼並熱忱相助的美國學者則有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饒大衛（David N. Rowe）、戴德華（George E. Taylor）、梅谷（Franz Michael）、史麟書（Earl Swisher）、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等近代史名家，諸人對近代史所的愛護與支持，有益於當代史學學術的建樹，是海內外學界所當留心研考的。同一時期，一些旅美的華裔學界耆宿，對郭廷以所長的肯定與尊重並大力支持的，如楊聯陞、何廉、劉廣京、房兆楹、袁同禮、郭穎頤等前輩，近代史所同仁都深感厚愛與永遠存記其教導支持。以我個人而論，我是受恩於劉廣京先生教導最多，一直奉以師長之禮。

我不會遺漏郭師一個最重要開拓，是在民國 51 年開始的福特基金支助的合作計畫。我對此事深感憤慨並看清我們學術界的黑暗醜惡。這在學術史上將是巨大疑洞。因為關鍵是一筆福特基金的十五萬美金，當時是一筆巨款，受人覬覦，下手爭奪。郭廷以所長備受排擠打壓，逼到自動辭職。最後終由韋慕庭教授插手挽回，使郭師回任所長，郭所長未吐一句怨言，安心任事，像未發生事故一樣。他的高度容忍，令我落淚。他宅心仁厚，也令我欽敬。我體諒他以恕道應世的本意，在此不加申敘，概放之於過眼雲煙。比我熟知內情的人尚有王聿均、呂實強、劉鳳翰三位先生，俱已垂垂老矣。表面的故事，可以參閱張朋園之書。²²不過學界領袖的虛偽作假，裝腔作勢，滿口東西道德文化，一肚子齷齪卑鄙，卻已令我充分看透。

四、郭廷以先生領導下的學術活力

我已退休多年，早已遠離人事紛繁，天下之大，無縈於心懷。從天下國家重重縮小到這樣一個淺碟子水面蕩漾風潮，能有多大影響，引致收到史乘，我並無責權問今日世狀，但已明見世衰道微。尤其在史學，這是我五十年生命所繫，實已看不到未來，自然在此暮色深沉中，回顧昔日光華。當亦可能於後世學人留存一些今昔對照，致使我不能卸責，來寫這篇文章。

郭廷以先生不善交際，木訥寡言，惟其史學功力深

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有關郭所長講演及同仁報告，日期論題俱有記載。

22 張朋園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 80。

厚，學識淵博，蜚聲國際，尤得美國學界敬重，在其主持近代史所時期，使所在的南港，形成熱門的中外學術交流中心，學界名流，多來南港訪問，近代史研究所留存有清楚日誌。專門來所參訪者，留駐在一個月以下者太多，可以不提，現將居停在一月至一年的來訪學人，和來訪兩次以上者，開列於次，以見大致：

饒大衛，多次來訪，不下十餘次。蔣廷黻，三次以上。梅谷來訪，三次以上。坂野正高，二次以上。舒威寧(William Schultz)，經常來本所。史麟書(Earl Swisher)，經常來本所並作一年期駐所訪問。房兆楹來訪，兩次以上，並停留數週。費正清，來訪三次以上。韋慕庭，多次來訪，五次以上，並作長期居停。朱昌峻(Samuel Chu)居停十個月，又來訪三次。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來所訪問八個月，並又來訪二次。徐中約來訪三個月。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來訪居停兩個月。賴特教授(Mary Wright)來訪二次並停駐兩個月。佐佐木正哉來訪一個月。李相殷(韓國)來訪三次。宣道華(Stuart Schram)來訪一月。孟軻(Mark Mancall)來訪居停兩個月。王伊同，訪問一個月。唐德剛來訪三次以上。楊慶堃多次來訪，並展開合作計畫。閔斗基(韓國)來訪停駐十個月，並再度來訪。魏波渡(Bedo Weithoff)來訪半年。石約翰(John Schrecker)來訪留駐一年。以上所舉來訪者，俱係截止至1970年底，郭所長正式辭職以前，其他到訪學人，我搜輯未能周延，當有遺漏。

在此可以再加補充者是有若干學者，以學生身分來本所觀摩，後來成名後又以學人身分來所訪問者尚居不少，所能舉實者有康無為(Harold L. Kahn)、易勞逸(Lloyd Eastman)、包德威(David Buck)、康念德(Thomas L. Kennedy)、龐百騰(David Pond)、郝延平(Yen-ping Hao)、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等，俱已是馳名中外的卓越史家。這一方面，我的遺漏更多，但能略見當時學者對郭師的親和力。

其實以青年學生身分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前，來近代史所作相當期間留駐者，後來蜚聲學界者尚多。記憶所及有柯保安(Paul A. Cohen)、易社強(John Israel)、高慕軻(Michael Gasster)、黎安友(Andrew Nathan)、韓大衛(David Hamilton)、柏群山(Jonathan Potter)、艾文博(Robert Irick)和Prof. Suzanne Wilson等人。這裏也是不免甚多掛漏。

在上舉多次或停留長期的來訪者外，尚有不少到此訪問而應邀作學術講演者，亦是僂指難計，就所知者可略舉大概；前後來近代史所至少作一次講演者有：李宗侗、坂野正高、程天放、蕭一山、李定一、賴特夫人(Mary Wright)、歐陽無畏、唐盛鎬、房兆楹、費正清、卜覽德(原名待查，加州大學教授)、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徐淑希、韋慕庭、朱昌峻、蔣永敬、簡又文、費維愷、畢乃德、徐中約、孟軻、劉子健、王信忠、李田意、郭穎頤、李相殷(韓國)、艾文博、入江昭(日本)、顧瑞伯(Crawford)、馬若孟(Ramon Myers)、史麟書、王伊同、王家儉、鮑大可(Doak Barnnet)、龐百騰、丁博敦(Britton Dean)、李用熙(韓國)、車柱環(韓國)、權錫奉(韓國)、康念德、Ernest P. Young、張曼濤、吳文津、楊日旭、高爾遜(Ellsworth C. Carlson)、包德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郝延平、Arthur Michael Kleinman、許爾文(Irwin J. Schulman)、海聞道(Irwin Haytt)、柯培聖(Samuel Kupper)等學者，在本所大事記中皆留有紀錄。若李宗侗、費正清、韋慕庭、朱昌峻、王家儉等，皆反復講演多次，俱可以連前所載者，見出學術交流盛況，蓋以郭廷以所長為重心，幾至網羅天下同道。

前舉各樣記載近代史研究所的著述，一本三十年史，一本三十年大事記，一本張朋園演述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計畫，一本同仁廣泛回憶的心影寫照，本文只能參考，不能重複，私見卻以為尚有不少可補充餘地。我今寫來，是出以自由輕鬆手法，雜談近代史所中的瑣碎小節，不要求謹嚴詳備，或可補充他人忽略的小節。

我們這個機構的主體成員，估且不必計較外人的看法，我卻以為近史所堪稱濟濟多士，人才輩出。昔年我寫追憶文章，題目是用「地靈人傑」，載於陳三井教授所編《走過憂患的歲月》，此文又曾得中央日報副刊轉載。

今人喜言研究團隊，可以照抄此說。我們的中心導師就是所長郭廷以先生，他承擔所務之外，主要是領導研究方向，講論近代史上大問題，傳授研究方法，陶冶治學精神與提升水準。我們雖已出學園但仍得機會經常聽他教導。看看《三十年大事記》，可以清楚，他是講演最多的一位。我有幸在大學畢業以後又依傍他十多年，可用千錘百鍊形容自己。我不標榜是他的大弟子之

一，卻深信得其真傳，我敢於在大學講授十三種課，能於處置史料上、史學上難題，自是依恃鑽研深入，我的著作皆可覆按。

再說我是中庸愚拙之材，同列郭師門下，在近代史所做學問者，則多英華競爽，天資卓異。可簡略提示幾位。

如賀凌虛先生學貫中西，而後來轉向於政治學，追隨薩孟武先生並在學術上繼承他。

呂士朋先生，他有專文紀念在近代史所受業於郭師的經過。呂氏明快敏銳，辯才無礙，同仁中極其活躍，可以隨處聞其聲影，但卻較早離開近代史所，隨楊紹震先生前往東海大學高就了。

王聿均先生，他是郭師早期大弟子，最受倚重，當年所中重要大事，多所預聞，又被青年同仁敬重，實是郭師以外最當重任之人。他學殖甚廣，尤工擅於文學，長於寫散文，由於早著文名，頗以文學家自許，且是桃李滿門。其於近代史所之事，所知甚多，且曾受郭師命代理所長，後又專任所長八年之久。所中前後憂患歷程，他知之最悉，可惜不肯吐露。而今只有我一人願寫，但所知甚少，不能信口亂說，只有摭拾一些見聞搪塞了。

和王聿均先生相等地位的人士尚有李毓澍先生和黃嘉謨先生，各有學識專長，是郭師早期門人，在近代史所亦居中堅地位。惟性情與王聿均先生不同，青年同仁並不與之拉近關係，各有一段距離。惟郭所長亦事多倚重，尤其行政事務，依李甚多。在此附敘於王聿均先生之後，以表露近代史所開所以來的中層研究人員，在頭十年來，有相當顯著的表現。

呂實強先生苦讀勤學，有堅實學問基礎。專長在於中國輪船航運，以及自強運動人物思想，於丁日昌、馮桂芬、王韜均有專著。又特專長於近代反基督教思想，也有專書，於社會史、佛教史並有涉及表現其學問寬廣。郭師知其勇於任事，故依信甚深，後來繼王聿均先生任近代史所所長。

李國祁先生，在我們一代追隨郭師的後期學生中最傑出的一位，他留學德國獲漢堡大學哲學博士，我佩服他的學識廣博精湛，才識過人，治學又勤，在近代史的專業上無所不涉，甚具功力。同輩一向推尊為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共同領袖，尤其在郭師退隱之後，他是大家仰賴的領導者。可惜他在學界甚不得志，內外受人嫉妒

排斥。僅能在師範大學主持歷史研究所和任文學院長。高雄中山大學成立，借重他的學識與能力，也邀請他擔任教務。但是一些學界大老及其門人子弟，把持學術對李國祁極加排斥，所以被提名院士候選人，四次均未能成功。第四次提名時李先生已是退休老人，雖有李亦園院士推薦他再選，未料有某院士，出面阻攔，竟又遭受失敗。

王璽先生是姚從吾教授門人，由姚先生推薦來近代史所。王氏精心專志好學，長於近代中國礦業與礦權，著有《中英開平礦交涉》，並兼長中日外交關係，著有關於中日通商立約之史專著。可惜他提早十多年退休，並於二年前去世。

王樹槐先生在近代史領域，有多方面專長。屬於外交方面著有《外人與戊戌變法》，並有專書《庚子賠款》。關於清季回民起義，著有關於雲南回變之書，其更具功力的專長在經濟史方面，特別長於近代電氣工業。王先生治史方法的特長是精於數字，長於統計。須知近代史所中在二十年前早被大陸學者指稱是統計學派，當時是指魏秀梅、林滿紅兩位，其實王氏是正宗統計學派。同事中尚有張朋園、賴惠敏都是統計學派。代表近代史所一門特色。

李恩涵先生最擅長近代外交史，是學界公認外交史權威，同時兼治近代工業史，特別是鐵路與礦務方面，此外他還研究反基督教教案問題，並涉足華僑史研究。

張朋園先生有多方面專長。是近代議會史名家，是立憲派研究權威，入手是表現統計方法。又是梁啟超研究名家，開闢先路，其精彩，早博大名。又是研究中國區域近代化領袖，有十餘年投入經驗。只是跟著洋人的淺薄理論跑，我是十分反對。他一直甚得郭師喜愛，中外交遊亦廣，特別受到美國老師韋慕庭的寵遇。也會在師範大學主持過歷史研究所。一般看來，在我們同輩中是最走紅的人物。

王萍女士是近代史陣營中，最早投入科學史研究之人，著有西方曆算學的輸入，更又研究大算學家梅文鼎、梅穀成、李善蘭、張文虎以至英國曆算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等人。以輩分學校出道早，是南京金陵女大出身，在本所頗受郭師倚重。

張存武先生，是姚從吾教授引薦而來。最擅長近代中韓關係，著有《清韓宗藩貿易》。亦長於中美關係，著有《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同時亦注意研究

海外華人活動，若干論著俱涉於華僑史研究。生平與韓國學者交往甚多，有不少韓國學界朋友。

劉鳳翰先生以近代軍事史馳名國際。著有《新建陸軍》和《武衛軍》兩書。其致力於抗戰軍事史尤深切而熟稔，各大戰役、各地軍伍將領如數家珍。

趙中孚先生專擅近代東北歷史，移民、農墾、工商、都市、馬賊、鬍匪，俱有研究，尤以研究鬍匪最見深入，同時亦研究東北現代化。著有《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一書。

林明德先生治學勤奮，鑽研深入。專門研究中日外交關係，於中日兩國檔卷史料最為熟悉。實為近代史所中日問題權威。著有《袁世凱與朝鮮》一書，極受日本學界重視，東瀛學界備加崇重。

陳三井先生明敏過人，才高心細，而沈穩內斂，才不外露。學問專擅中法外交關係與文化關係，亦留心於中國近代化史，最專注於上海國際都市的形成與發展。所研探的是現代化史實，面對一個近代大都會的種種現象與特色，不能不按部就班、自個別論題入手；急於創造理論，只徒自欺欺人，三井是抱此信念研究上海。

黃福慶先生，他生性樂觀謙和，任事幹練，才智過人，且勤敏治學任勞任怨，故像我一樣，在所中出力編纂檔案集最多。他雖勤力編刊多種檔案，而於研究著述亦不落人後，長於留日學生與中日文化教育問題，均有著作問世。

蘇雲峰先生因係出身教育學專業，生平致力於近代教育，自清末教育改革以至 20 世紀各省大專學校，均有深入探討，其著作除教育改革外，凡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海南大學等均有專書問世。同時又致力於中國區域現代化研究，著有湖北現代化專書。

陶英惠先生是近代史家吳相湘門人，學問根柢堅實，講究文筆運用，有相當功力。原來研究湘軍史，後來專心投入蔡元培研究，並研究當代學術研究機構，最熟悉中央研究院的先後演變。同時亦用心於民國人物，多為之撰立傳記。陶氏亦長於編纂史料，編刊有《胡適楊聯陞書信》，《蔣馮書簡》，以及《王世杰日記》等書。陶氏長期借調到院務室掌秘書，剝奪大量歲月，致不能於治學上多展功力。

陳存恭先生，他長於近代軍事史，尤熟稔各大軍系領袖人物，同時注意列強對於中國軍事防制，故有列強禁運軍火的專書。由於陳先生在所中承擔口述史計畫最

久，接觸軍政人物最多，十分熟悉廣西軍系規模，為白崇禧作口述記錄，並亦深入熟稔山西軍系，手編《徐永昌日記》十二巨冊。陳先生亦特別致力近代山西之現代化歷史，有著作稿，但未刊布。

張玉法先生醇厚精明，寬仁恭儉。內蘊深而不求表現。生平著作之多為同仁之冠，顯見思捷才敏，下筆成文，在近史所中無出右者。早先留意於政治史之黨派團體，著有專書三種。同時又究心於中國區域現代化問題，著有山東省的近代化專書。由於張氏學識淵博並又擔任近代史所所長六年，多年前被選為院士，自是實至名歸。

陸寶千先生是郭師在最後離臺赴美講學時始聘為助理研究員。郭師與美國學界相約三年訪問哈佛、哥倫比亞及夏威夷三所大學講學，行前始將陸先生臨時職位改為正式人員。陸先生年事比我長，學歷比我高，學識比我強，而久經沈淪下位，甚是委曲。其近代現代史研究著重在思想界名家，如郭嵩燾、劉蓉、倭仁、羅澤南、朱熹、汪中、莊存與、龔自珍、康有為、章太炎、歐陽漸、馬一浮等，多有深入研究，尤於馬一浮撰著甚多。其所著《易經文義通解》五十萬言，代表其師儒獨創格局。此外並擅長歷史地理，但不同於傳統之沿革地理風格。

在郭師所長悉心陶冶訓迪之下，同仁主體尚不止前舉二十餘人。其外尚有一半優秀人才較早脫離這個團隊，各自另圖發展，多半天資高而企圖心強。最早一批是鄧汝言、李作華、李念萱，前兩人是我同班同學，成績一向在我之上，是上上美材，他二人赴美有極好的發展。李念萱則因細心幹練，被院方拉去做總務主任。早期一批尚有三位佳人，就是許淑真、王執文、駱雪倫。許淑真早赴日本，後兩位則赴美國，俱有美好的成就。接著又有許大川、李本唐、馬天綱三位都是英英競爽，氣宇昂揚，他們較我年輕，而溫文誠懇，又熟諳交遊禮貌，我向他們學得打領帶，喝咖啡，以及西洋交際儀節。尤其許大川出身書香之家，翩翩公子，充分表現高雅出俗。他們三人離開我們去英美深造了。接著是謝文孫、賈廷詩兩位，是郭師約束負責口述史的生力軍，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合作進行的一個當代史計畫。二人都具外交長才，謝似紳士型，賈似官吏型。尤其賈廷詩是洋文不離口，同仁多半與賈廷詩開玩笑，這要全靠他的外交辭令抵擋了。後來二人俱赴美留學。接著又有史靜波和魏

廷朝，俱有政治法律專長，惟亦兩年餘即他去，史靜波先生則有獎學金赴美留學。接著又有夏沛然、亓冰峰、李文蓉、郭正昭、李正三共五位。亓冰峰與李正三均得美國大學獎學金而離職，李文蓉則與亓冰峰結婚隨夫婿赴美。郭正昭在所中研治科學史以及近代學會，已具重大進展，可惜亦赴美留學，後來以其才華而在金融界大展身手。接著一位金承藝先生來所時已是桃李滿門。北大出身，專治清史，他本身又是滿洲宗室愛新覺羅皇族一支，出儲英後裔。來所不及二年，後至澳洲墨爾本大學任教，為人爽朗曠達，寬大仁厚。與我交契至深，多年俱有來往。聞說他已病逝澳洲，我心中不能接受這不幸的消息。尚有兩位特別須提，一是魏秀梅女士，一是李健民先生，他們是郭師延攬而來，直到多年後纔補上正式名額，其在所出力尤當載述。另外尚有兩位誠懇篤實的學弟林泉和嚴錦，他二人工作很久，沒有機會補為正式研究人員，終不得已離開本所，均另有高就。只是我認為是我們的損失。

算來郭師延攬人才，有一半早先求去，皆係當時英俊俊髦。這是近代史所重大損失。留下一半人才，使近代史的發展受到嚴重延滯。看看我們的努力成就，我們並不以為滿足。

郭廷以先生創設近代史研究所，可謂是慘淡經營，我是第一年來所受教，一切自零做起，錢思亮院長當面稱我是 Founding Member，當然有理。但我仍是末學後進，日久方有一定造詣。不客氣實說，在郭師領導之下我們這裡二十餘位追隨者，在近代史一門學問上有眾多建樹，我們博得中外同道肯定。這也不是憑主觀自我稱許。學問是天下之公器，我們有許多出版品可以覆按，任人評品。就是大陸上近代史的學者二十年來也都對我們存有敬意。我們的學術成就有著作目錄和出版品名目可查。²³ 你可以在學術上一比高下。我們生活在憂患艱鉅中，總有人嫉妒，想否定我們，背後講壞話，又無能力用文字在學術刊物上光明正大批評。頻施鬼蜮伎倆，我們也十分清楚。體諒郭師的仁厚寬大，盡其在我，不作計較。

五、結 論

我之必須撰寫此文，是天時人事勢有使然。追隨郭廷以先生的後輩門人中，我雖算是 50 年代（民國 39）前期弟子，可是比起中央大學早期開山學長，只是末學後進。抑且在同輩之中，高手如雲，論學問歷練，論文彩才華，我是遠在衆人之後。在郭師門下，我算來有八、九位是比我有資格撰寫郭廷以先生一門史學規模。多年來我是無心要寫此文。

另外的因素，第一是呂實強學長早已寫過郭廷以師的學問，是最值得參考的先範。第二，近代史所已在 74 年（1985）刊布三十年史又刊布三十年大事記要。我的同仁朋友都以為已夠詳備，而且是正宗正派的學術紀錄，應該是最權威了。我也同意並加詳讀。不過我以為還有必要以郭師為中心，交代出今日所習稱的研究團隊（不說門人後生）以及中外交流學人來往穿梭其間的盛況。別人已不肯再寫，後人將更無人理會，我若不能稍加表揚，心中有所不安。目前來說，只有張朋園一書是以郭師為中心深入而詳盡。但他所定範圍甚專門而狹窄；我所定領域是郭師擔任所長一段盛況。希望經我的拙筆暴白一二，不必重複他人著作，同時舉實不少人物，其可貴就在此。我只怕遺漏人名，最怕忽略他人的成就。我若不這樣寫，有誰能弄得清楚？有誰願提這些人物？自全然看不出郭師的影響力，以及其包容胸懷。

郭師開創近代史所，對於這個團隊有何重大貢獻，可據實臚陳於次：

第一，郭師利用國家微薄經費，只能維持本所行政人事，而購置圖書，出版費用則多向美國各大基金會募化而來，可以充實所中設備。但郭師個人始終未曾公器私用，利用所中藏書以及後來的珍貴檔案寫任何文章，全然公之於世，陶訓造就青年後輩。這種成全他人之風範令人欽敬。

第二，郭師自創所第一年即與外交部執政者要求將外交檔案轉存本所，正逢葉公超、時昭瀛、沈昌煥、朱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著作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1 年 6 月印。

撫松幾位富歷史遠見、有國家責任的外交家，信任我們的學問能力，慨然將北伐以前的外交檔案送來本所收藏，用以編刊檔案史料。接著數年郭廷以先生又與經濟部主政者李國鼎、王昭明、趙耀東等首長聯繫要求將經濟檔案交近代史所保存，亦得這些有遠識、重學術的欣然同意，將大批檔案七百餘箱送交近代史所，這些資料十分珍貴，我想這是郭師對學界最大的貢獻。

第三，郭師主持所務期間，中外學術交流是其精力勞瘁所在，所開展之合作計畫，計有與亞洲協會編《三朝夷務始末引得》，與華盛頓大學合作中俄關係史料，與哈佛燕京社編選中國近代對西方之認識以及教務、教案檔之編輯，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口述史計畫等。最重要的還有與福特基金會合作連續兩次的五年計畫，對近代史所同仁之出國進修有重大助益。這些俱是郭師憑其國際聲望而對於近代史所的貢獻。

第四，這一點最重要，郭師諄諄垂教，陶冶提携後生學子，心血沒有白費，為 20 世紀後半期，造就三十餘位近代史專業人才，在許多研究領域都能獨當一面。我所列舉於前者，俱為郭師悉心陶鑄成全的結果，完全歸功於郭師的循循教誨。包括在海外的幾位同仁，在學術的成就與聲望，我們足以被稱之為南港學派而無愧，依我的詮釋：一則以郭師建所為中心，以近代史為領域，以嚴謹治學為通式，以自由表達各展才華識斷為原

則，以重大問題為對象，以歷史專論建立一家之言為宗旨，以創造一代學術風貌為天職。這就是郭廷以先生所調教鍛鑄的南港學派的共通風格，我們以此自稱，出於寫真，決不含糊。

當 1977 年我受聘去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行前即早購讀 1973 年所出馬王堆帛書老子和銀雀山所出竹簡兵書，特別是孫臏兵法。深怕遇到高手，提出這種冷門之書難為我。我是有備而來，既來之則安之。再加上我平日多讀古籍，在學界與人交手，還能應對得上。我出郭師門下，但近代史仍是弱勢團體。我們必須自我充實，自立自強。我久在學界，看過各式各樣學者，聽其談吐，心中自有尺度，辨識出每人分量，豈會受人欺愚。我只本著郭師寬以待人之心處之，重在學問千秋盛業，如非來犯，決不與人過招。只是近代史所在中央研究院居於弱勢，偏有人拿打擊近代史立威，挑剔近代史所，用以立威，十分便宜。近年又有一位社會科學界人士頗為張牙舞爪，他們毫不懂近代史，偏是意見多多，不知甚麼是學術專業。雖然如此，近代史所早博得國際聲名，多年來大陸上史學界仍是敬服有加，能夠在學術界長期維持他人敬重的學問實力，偏在中央研究院受盡委屈；出版質量遠在各研究所之上，而卻不被重視。學界之偏私可見一斑。